

主体、自我、身份——关于符号自我的考察

陈文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主体问题贯穿西方思想史,对于主体的研究大致呈现为建构、解构和再重建的过程。主体符号学中的“主体”在进行“文本表意和解释”时便产生了“自我”。从主体到自我,考察自我的内部划分和外部交流;从自我到身份,自我具象化为身份的展演。从“词与物”的对应到符号象征,考察当代文化造成的身份——自我危机。与意义世界保持距离,从而为危机的解决寻求可能的途径。

关键词: 主体;自我;身份;主体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IO-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1-0089-06

Subject, Self and Identity——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ign of Self

CHEN Wenbin

(Institute of Signs & Media,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subject runs through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the researches on subject roughly undergone a process of discovery, construction, dismantling and reconstruction. The “subject” in the subject sign produces “self” when expressing and explaining texts. From subject to self, internal division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self are investigated; from self to identity, self is concretely presented as the identity exhibi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word and object” to the sign symbol, the identity self-crisis caused by contemporary culture is investigated. Keeping a distance from the meaning world, we can seek ways to solve the crisis.

Key words: subject; self; identity; subject sign

一、主体的建构与解构

(一) 主体演变与符号自我形成

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语境,“主体”概念的语义不断发生变化,对于主体本身的分析和争论贯穿于西方思想史中。智者派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句话解构了作为“一”和“尺度”的逻各斯,对于不同个体,事物就表现为呈现在他面前的状态,阐释的相对性赋予了主体以独特性,昭示了主体的自信。其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主体建构的工程,康德将主体作为先验根据,到了黑格尔则把主体等同于“绝对精神”。

胡塞尔晚年提出“交互主体性”,主体不再孤立,而需要和其他主体共同存在。到了海德格尔,“此

收稿日期: 2015-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编号: 13&Z0123)

作者简介: 陈文斌(1992-),男,江苏溧阳人,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主体符号学。

在”作为人的具体存在与世界相联系,而“与传统的主体性不同,《存在与时间》所提出的此在具有一种渗透力和离心力的特征”。^{[1] (p60)} 拉康“镜像阶段论”的“误认”昭示自我不过是对自身想象的产物,主体由他人的语言所建构。福柯呼应尼采,宣称“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 (p506)} 到了德里达那里,通过“延异”的不确定呈现,“主体和真理的幻象在书写的延异链上分崩离析”。^{[3] (p879)}

西方哲学史中对于主体的讨论涉及了“主体有”与“主体无”的对立、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辨析、解构主体与捍卫主体的博弈等。按照彼得·毕尔格的分析,从奥古斯丁到罗兰·巴尔特,这中间卷入的思想家及其观点基本上呈现出了主体退隐的态势。

在退隐的历史中,不论是建构还是解构,主体问题都与符号自我相关涉。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自己同自己的思想展开对话,这其中卷入了“自我”问题,“我”获得了一种确定性的存在,成为能够把握的对象。在笛卡尔这里,自我分裂为二,审视与被审视集中在一个主体之中,两者能够进行表意和解释的互动。同时,理性的我能够控制激情的我,主体从而获得一种稳定感。在这种对话过程中,符号发送者和接收者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在主体之内,符号自我分裂为二,但存在着等级差异。“理性的我”能够服从于主体稳定的要求,“激情的我”则拥有强烈的情感,笛卡尔要控制激情就需要寻找确定性的基石,“我思”中的“我”恰恰就是“理性的我”,掌握着符号自我内部交流的绝对权威。这样建构起来的主体就有着极强的控制力和目的性,为了主体自身的需要不断地向外界拓展,从而建立了主体征服世界的信心。

“当一个人对自己及世界进行意义追寻的时候,自我的经验开始形成。因此,一个自觉的自我,必然也是一个符号自我,因为他思考世界的意义,反思自己的意义,寻找的是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4] (p15)} 符号自我的确立建基于对意义的把握,不管是笛卡尔对于“我思”的自信,还是尼采言说“上帝死了”都是对于意义本身的追问。前者相信符号自我的对话能够把握自己的存在,后者言说主体的死亡不过是对这种自信的怀疑。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道“上帝死了:依照人的本性,人们也会构筑许多洞穴来展示上帝的阴影的,说不定要绵延数千年呢。而我们,我们必须战胜上帝的阴影!”^{[5] (p191)} 上帝虽然死了,但是上帝曾经占据的位置却没有得到填补,这个意义的空缺实际上就造成了“不在场的在场”,上帝成了空符号。而空符号本身并不是虚无,“上帝的影子”就成了这个空符号的隐喻,与影子的斗争仍旧是符号自我寻求意义的过程,上帝死了,但是人类还需要继续寻求存在的意义。

作为主体的人在进行意义思考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符号自我是寻求意义的产物。我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这是自我内部的意义操作,我在我所思的对象之外存在。我向外寻求自我存在的根源,寄托于先验的上帝,抑或言说上帝之死,都是在诘问自我存在的起始问题,卷入意义反思的主体最终都导向了符号自我。

(二) 主体符号学中的“主体”

“主体问题是符号学领域中最困难的课题。”^{[6] (p131)} 主体问题不仅要卷入概念辨析,牵扯到复杂的哲学史争论,同时,在主体符号学建构过程中,作为意义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主体联络着意义的两端,符号的编码机制和阐释机制都依赖于主体的作用。在符号传达过程中,符号载体问题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而两端的主体既可以看做实体,又能够抽象存在。把握某个主体的存在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实体,这是从特殊性而言;而在整个人类表意过程中,主体又是抽象地存在着的,这是从一般性而言。正是因为这种特殊与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兼容,主体飘忽不定,使得对主体的研究困难重重。

在建立主体符号学的尝试中,唐小林提出“主体符号学,既是关于‘符号的主体学’,又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7] (p101)} 前者考察人在符号内部结构中的位置和运动方式,即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包括主体对于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后者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用符号学原理来考察人本身。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却存在问题:一方面,作者强调“完整的主体符号学,只有在这两个维度上才能建立。”另一方面,作者紧接着又称“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仅有第一个论域,即‘符号的主体学’才有资格成

为‘主体符号学’，这与‘主体性哲学’类似，它始终把人作为符号的出发点和中心。”^{[7] (p101)}

显而易见的是，按照作者的表述，主体符号学的建立虽然要依赖于两个维度，但“符号的主体学”明显要比“主体的符号学”重要，而其论述却可能导致相反的逻辑推论。“在前一个论域里，人是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可称之为‘符号的主体学’；而后一个论域，则是关于人这个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可名之为‘主体的符号学’。”^{[7] (p101)} 根据这段界定来看，在“符号的主体学”中，人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在“主体的符号学”中，人这个主体被置于符号学理论的考察中。两处都使用了“人”这个概念，前者将人作为社会意义层面上的主体，后者将人作为符号表意与解释层面上的主体。实际上，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的应该是“自我”，如果都用“人”来指称，前者将从属于后者，作为符号主体只是考察人这个主体的一个角度。

正是这样的纠缠，唐小林在强调了“符号的主体学”重要性之后出现了笔误，论说道“而‘符号的主体学’不过是符号学理论在‘主体’研究上的应用，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7] (p101)} 这里由于“主体”和“人”的纠缠，误贬了“符号的主体学”与之前的论述逻辑相悖。

概念使用的误差根源于“主体”和“人”两者的纠缠，“符号的主体学”中的“主体”指的是进行符号意义运作的主体，控制着符号的表意与解释。“主体的符号学”中的“主体”指的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人”本身也是“主体”，但这里“人”的概念已经包含着实体性和实践性。所以在“符号的主体学”中，进行表意与解释的主体不能再称之为“人”，而应该称之为“自我”。因此，“符号的主体学”考察的“主体”是“符号自我”，“主体的符号学”考察的是“人”这个社会主体。也正是对于“符号自我”的研究才奠定了“主体符号学”的根基，避免卷入西方思想史中对于“主体”概念的论争。

二、作为文本表意与解释的主体——自我

(一) 自我分层和对话他者

按照上述的论证，本文对“主体”和“自我”的关系进行了厘定。“自我”进行的符号意义运作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威廉·詹姆斯将自我区分为主我(I)和客我(ME)两个方面，用主我来指代自我积极地知觉、思考的部分，用客我来指代自我中被注意、思考和知觉的客体。这样在自我内部就形成了主客二分的形态。米德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主我与客我之间在进行对话，指出“我对自己说话，我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或许还有它所带有的情感内容。此刻的‘主我’出现在下一刻的‘客我’中。”^{[8] (p137)} 在米德这里，主我与客我的对话就处于一种时间流动中，“自我的思索是逆向的，自我的内心对话是现在的我朝向过去的我”。^{[4] (p16)} 诺伯特·威利综合了米德和皮尔斯的观点，将符号自我划分为“主我——你——客我”的三元式，简言之，可以将“客我”限定为过去自我，“你”是未来自我，“在思考过去的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自我；在思考到我此刻之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自我”。^{[9] (p82)} 这种三元思维模式“能更有力地说明人如何参与时间性。我们是三分式的：同时分别处于过去、当下和未来”。^{[10] (p16)}

意义的发生依存于自我内部的划分，除此之外，在整个意义网络中，自我还必须处理与外界的关系。这样，“他者”的存在就勾连了符号自我与外部意义世界。以胡塞尔为代表的主体间性理论产生于对主体问题的反思，为了消减笛卡尔“我思”的优越性，提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范畴，主体意识的形成建基于与他人的交往，意义的发送和接收存在于不同的主体之间，“我思”还停留在自我内部的对话，而“他者”地位的强调则克服了自我的唯我论倾向。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主体间展开对话，自我与他者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两者之间的意义交流将形成一种理想状态，发送者发出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承载文本意义，接收者解释意义，但是“在人类‘正常’的符号活动中，三者不一致是常态”。^{[11] (p50)} 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借助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理性对话达到意义一致的最大化，从而避免某一方对于意义的垄断，从而构建了理想的意义世界。

而到了列维纳斯，他者具有“非同一性”，即他者不能被自我同一，这样就消解了自我中心主义，无法将自我的意向强加于他者身上。在列维纳斯那里，主体本身具有服从的含义，“主体的英文是 subject，

本身就有服从(subject to)的含义,从词义上讲,主体就是服从”。^{[12] (p67)}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再到列维纳斯,他者地位的改变实际上是对自我中心的反拨。理想的平等状态只能是幻象,而双方的不平等也不一定就是自我服从于他者,意义诠释本身裹挟着福柯所言说的权力,因为“福柯把各种各样的自我、性、知识、惩罚、规训等现象,都归结为‘权力’运作的产物,把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都还原为权力的功能”。^{[13] (p195)}因此,自我对于意义的发送与接收始终处于复杂状态。

(二) 对于自我的考察

自我可以在内部进行分裂,同时,自我在与外界交流中又要面对他者,主体符号学的“自我”建基于这两个层面之上。而这两个层面中的符号运作机制又存在差异和共性。就差异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知能力差异。自我内部的认知能力是可以同一的,主我与客我因为是由同一自我分裂而来,就共时性而言,主我与客我能够达成认知上的默契,例如喝水,主我和客我都能明白水是什么。而自我与他者由于地域、文化、语境等的差异很难达到认知一致,这样就会导致意义发送与解释之间的冲突,甚至于解释本身完全与意图相悖,例如英语中的water,被一个不懂英语的中国人理解为窝头。

二是反馈机制差异。在自我内部,主我与客我之间始终存在着互动性的反馈机制,主我审视客我,客我能意识到自己被审视,主我对客我进行评价,客我能针对评价进行辩解或反抗。即使客我不作出反应,对于主我而言,这种无作为同样是一种反馈,因为主我能判断客我是因为什么不反馈。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他者不一定会做出反馈,而不反馈就不能传递更多有效的信息,反而会削弱意义的交流。自我是不能洞悉他者的,正如列维纳斯用“面貌”隐喻“他者”一样,“面貌是一种高度,是我无法达到的至高无上的高度,是我与他者的差别所在,也是他者的差异性所在”。^{[12] (p64)}剔除其中包含的他者至高性,他者无法被自我所左右,反馈机制本质上是单向度的,双向的互动不过是两个单向度的暂时协调。而自我内部则在不断进行“对话”,“(主我与客我)它们作为这个整体自我的不同侧面,在参与社会互动过程的个体那里是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14] (p68)}

三是元语言差异。“符号学讨论解释的规则,往往用元语言这个术语。”^{[11] (p226)}在整个表意系统之上需要借助于元语言进行统摄,在自我内部,不同个体针对于主我与客我的对话有一套元语言,元语言的构成建基于个体特性与外界影响,个体特性具有自发性,在外界影响的综合作用下,每个自我将形成不同的元语言,也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主体。而在自我外部,存在一套共时性的元语言,即不同个体在不同环境下将被迫趋于统一,不完全受自我主观意愿和能力的控制。这种最高层次的意义解释规则,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每个个体都将受到这个元语言的控制和影响,自我内部的元语言也不能幸免。所以从元语言的性质和范围上看,两者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主体符号学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样具有共性,这种共性本身已经包含在第三点差异上,自我内部无法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归根到底,自我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只有社会化的‘我’,才是一个有意义能力的主体”。^{[15] (p132)}自我必须存在于意义世界中,自我本身就是意义的存在之地和敞现之所,不管是内部的分裂还是外在的交流,自我作为核心范畴保证了意义的流动,对于自我的分层也是为了明晰主体符号学中问题探讨的路径。

三、社会化的自我——身份的展演

(一) 具象化的自我

自我作为抽象概念在社会化过程中无法悬空,因此,身份就成为自我的具象化呈现。这种呈现本身就是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呈现的原因归结为意义机制的需要,不同个体的自我之间无法直接进行对话,这也就是说心灵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意义交流,至于心象传递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

在自我内部,意义的发生有一套自己的元语言,这套元语言的产生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外在世界“词与物”的对应是社会化的第一步,但这种对应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对错误的修正中,也就是自我需要不断适应社会元语言。举例而言,一个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孩子,家长用捂着脸这个动作

教导孩子,说这个动作代表“害羞”。在另一个场景,电梯坏了,家长告诉孩子:“这个电梯坏了,要修。”孩子就会将“羞”与“修”这两个字等同起来,以为电梯坏了需要捂着脸。自我内部“词与物”的对应最初就是这种半社会化的状态,而随着外在的指正和自我的觉醒,改正错误的过程就变成了主动遵循社会元语言的过程,“‘我错,故我在’通过试错,一旦认错,看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局限,发送和接收符号意义的自我就出现了”。^{[16] (p99)} 正是在不断地自我纠错中逐渐融入到社会文化中。

“词与物”的对应涉及到语言问题,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语言本身不仅促进了自我内部的成长,同时,语言的使用也成为自我具象化的主要途径。使用不同的语言将展演出不同的身份,不仅语言种类的差异能区分身份,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表述也将造成身份的差异。即使是丧失语言者,手语、呜咽、嚎叫等其他方式也属于广义上的语言,而文字则是语言的书面化。举例而言,一个亚洲人,说英语与说中文就能将自我进行不同的具象化:华裔与中国人,英语流畅者与不会英语者,媚外者与爱国者……仅使用语言的种类差异就可以进行身份的展演。再者,同样说中文,口音的差异将展演不同的地域身份,词汇的多寡和水平高低将展演不同的文化身份。语言成为自我展演身份的主要媒介,在具体语境中,恰恰是语言的变动能够影响身份。

从“词与物”逐渐对应到语言的掌握,自我内部对话与外在交流都需要语言,而自我的具象化除了语言之外还囊括了其他多种要素。内部对话诉诸心意,外在交流诉诸于听觉,而化妆则可以诉诸于视觉、嗅觉和触觉。通过符号象征同样可以展演不同的身份,外在符号与身体的结合将构成不同的身份。这种身份并不一定与内在自我相对应,诉诸于其他感官的身份展演恰恰是一种修辞效果的呈现,广告的作用就是通过不同商品的叠加实现不可得的身份欲望,从而呼唤受众消费符号。拥有名牌手表对应社会精英,使用名牌香水或高档面膜等同于社会名媛,这种外在符号与某个身份的对应就在消费社会中被强制捆绑,形成的阐释策略也被消费者内化,消费者接受了这种身份与符号对应的阐释机制,自我具象化的过程就变成了附加各种符号的过程。

身份之所以会变动是为了确立存在感。语言纠错中的“错”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阐释机制而言,纠正错误才能融入社会。外在符号的附加是为了填补意义的空白,正是因为缺乏存在感,才借助于外物将我的身体变成某个身份的象征。也正是共同遵循这种符号认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群体,在这些群体中获得了存在感。这种获取身份的过程遵循着“范畴化”、“与他者比较”、“归属某个集团”^{[11] (p345)} 的排除过程。这种获取的过程将在不同身份集团中展开,一个自我可以包含多重身份,多重身份的展演同时进行这三步排除过程,自我在不断的取舍中就将陷入身份的焦虑和困惑中,单一的身份已不可能,多重身份又会冲击自我的稳定。不同身份需要不同的阐释策略,自我内部的分裂将需要同时处理不同的对话机制,内外双重压力造成了当代文化的身份——自我危机。

(二) 身份的危机与拯救

在英语中,identity一词同时包含着“身份”与“认同”双重含义,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便容易造成混淆。但从词源上考证,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即same,同一)。由此来看,identity的基本含义应当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17] (p62)} 这样就切合了身份展演的三步,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寻找到身份集团的同一性,进而在其中确立自己的存在感。

就自我与身份的关系来看,“在具体表意中,自我只能以表意身份或解释身份出现,因此,在符号活动中,身份暂时替代了自我”。^{[11] (p341)} 也就是说,身份成为自我临时表意的具象化呈现。自我与身份是“一与多”的关系,同一自我可以有多种身份。但多重身份必然会影响到自我内部稳定,同一自我中的主我与客我需要对应不同身份,因此,主客我多样化便造成自我的内部危机。

身份——自我危机在内外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为了确立自己的存在,身份不断变动以适应当代文化的动态化更新,身份的不断切换与多重叠加造成了自我内部对话的压力,主我与客我在这种变动中不堪负荷,同一自我无法不断分裂成不同的身份对应体。整个危机的态势就变成:当代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造就了身份的多样化呈现,同一主体处于其中就被卷入多样化的动态更新中,新的身份不断产生,原有的

身份随时可能被淘汰,同一时间段中需要同时展演多重身份,不同身份有可能迥然相异而没有过度间隙,自我不堪重负,便与身份无法保持同一,“身份的巨大落差往往意味着自我的崩溃”。^{[18] (p90)}自我分裂超出常态而导致精神危机。

当代文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身份——自我危机的解决仍属于“主体符号学”的关注焦点,即为人的有意义存在寻找理论指导和精神资源。回到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里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身份——自我危机恰恰就是因为迷失了自己,将自我抛掷在意义的洪流中无法寻找稳固的根基。

主体既然已经被消解过,重建的主体不再会回复到唯我论状态。建立在理性判断和怀疑精神下的主体必然要对自己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包括主体与意义世界的关系。对于主体而言必然地要面对内在与外在两种意义世界,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但并不是等同。内在自我可以与实践的社会层面的主体保持距离,自我具象化的身份是两者合力的产物,符号附加的象征承载在身体上,自我内部对话需要寻求安静的处所,即内在反思需要与外在纷杂保持有效距离,避免符号泛滥对自我的冲击。

梭罗定居瓦尔登湖,垮掉的一代行走在路上,福柯通过多变的身份让外界无法把握他的自我……已成窠臼的陈规将束缚主体,自我在模式化的意义流程中也将趋于“疲惫”,处于正项中的大部分恰恰需要意义上的标出。只有将自我与世界保持距离,才能在整个当代文化中寻找到一种意义的新鲜感。只有洞悉符号的重复和累加,看清符号本身的复制与更新,自我才能在意义的洪流中形成一种超越的哲学,即符号自我可以悬隔外在世界中的意义重负。总之,自我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主体符号学也需要不断突破框架的束缚,与主体本身的发展相呼应,主体符号学的建构必将在这种动态中找到自己的学理框架。

参考文献:

- [1]〔美〕弗莱德·R·多迈尔.主体性的黄昏[M].万俊人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4]赵毅衡.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J].外国文学评论,2010(2).
- [5]〔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M].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6]赵毅衡.符号学与主体问题[J].理论与探索,2012(3).
- [7]唐小林.寻找灵魂:建立一种主体符号学[J].学术月刊,2012(4).
- [8]〔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 [9]马文美.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历史、身份、自我——以符号学为工具考察薛忆沩三篇历史题材小说[J].符号与传媒,2013(1).
- [10]〔美〕诺伯特·威利.符号自我[M].文一茗译.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 [11]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2]孙庆斌.为“他者”与主体的责任:列维纳斯“他者”理论的伦理诉求[J].江海学刊,2009(4).
- [1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4]李美辉.米德的自我理论评述[J].兰州学刊,2005(4).
- [15]赵毅衡.符号学与主体问题[J].理论与探索,2012(3).
- [16]赵毅衡.符号作为人的存在方式[J].学术月刊,2012(4).
- [17]阎嘉.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6(9).
- [18]闫文君.名人草根化现象中的身份——自我[J].符号与传媒,2013(7).

(责任编辑:张立荣)